

读常见书

札记

周本淳

江苏教育出版社

相與會於
辰遠關山難越誰悲
他鄉之客懷帝閣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
祖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
之心壯志益壯
2

310
读 常 见 书 札 记

周 本 淳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建湖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43,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43-0745-7

G·653

定价：2.90元

自序

顾亭林写《日知录》，强调要“采铜于山”。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要用第一手材料做根据，而鄙弃那种展转稗贩拾人牙慧的投机取巧行为。我自惭孤陋寡闻，但却奉顾亭林之言为圭臬。有时看到一些文章的论据，往往喜欢去找一找它的根源，在这个过程中也常常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

范成大有诗说：“老去读书随忘却，醉中得句若飞来。”我很爱回味这种境趣。年纪越大，对“读书忘却”的体会越深。为了医治这个毛病，就把见到的想到的一些不同的意见记下来。读的都是些常见的书，有古人的，也有今人的；发表的都是些平实的意见，没有什么惊人的宏论。问题有大有小，篇幅有长有短，内容有破有立，有浅有深；文体有语体也有浅近的文言。原来只叫做“杂记”，后来偶尔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几篇，有位好心的编辑认为“杂”字不雅驯，就改称为《读常见书札记》。

因为积聚了几十篇，有的朋友认为不失为“愚者之一得”，劝我汇编在一起，以便向关心这方面的同志请教，于是编成现在这本小册子。我因为关心古籍的校点工作，也为出版社点校了几部书。同时自少有“竞病”之癖，根据一些刊物的要求，写了一部分赏析古典诗词的文章。从广义的概念看，都可以算是“札记”。所以这本小册子大体上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关于古籍校点方面的意见，一些考据性的文章和诗词赏析。其中一部分是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的，收到小册子里略有增删，一律在文末注明。在本校内部刊物发表的，因为不算公开发行，所以不加注。几部书的前言，也有个人的一些观点，一并附后。

囿于自己的见闻，破立之中，见仁见智，未必尽当于理，尽合于人。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教，以利于学术之繁荣，是所至盼。

周本淳记于淮阴师专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目 录

《离骚》解题·····	(1)
《世说新语》原名考略·····	(6)
《辨奸论》并非伪作·····	(11)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决非成于绍兴戊辰说·····	(15)
《诗话总龟》版本源流考略	
——兼向郭绍虞先生请教·····	(19)
《宋诗话辑佚》有关《诗话总龟》条目补正·····	(28)
《四书》始名志疑·····	(42)
读校随感录·····	(44)
标好人名,方便读者	
——古籍误标人名举例·····	(58)
吹毛索瘢,涤瑕荡垢	
——谈《陈与义集》标点问题·····	(63)
曹刿其人,君子乎?刺客乎?	
——古文备课随录·····	(73)
风马牛不相及·····	(79)
《离骚》“委厥美”辨·····	(81)
“触龙”与“触詔”·····	(84)
“天下非小弱”解·····	(86)
终军请缨及生年考·····	(89)
王粲《七哀诗》第一首作年·····	(91)
“中外”质疑·····	(92)
孔雀·磐石·蒲苇	
——《孔雀东南飞》教学拾零·····	(94)

“英雄亦到分香处”	
——读魏武《遗令》	(96)
《雁门太守行》题义	(105)
“官奴”非王献之小字	(107)
“飞霜”与“埋轮”别解	(109)
“谢客”	(110)
新版《辞源》《辞海》释词义项补正举隅	(111)
童子·弱冠·他日	
——试论王勃作《滕王阁序》之时间	(119)
王昌龄早期颂扬扩边战争吗?	
——与吴学恒、王绶青两同志商榷	(125)
唐朝李氏的辈分问题	(129)
唐代取人之“身”	(131)
“炼师”词意变迁说略	(133)
“圣”为“侦探”说溯源	(135)
何谓“周星”	(137)
“金埒铜山”	(140)
“迷仙引”又一体作者	(141)
李白《草书歌行》的真伪	
——读《张旭年考》小记	(142)
《蜀道难》“自注”辨误	(145)
读甫之诗，识甫之心	
——舒雅《杜甫诗序记》评介	(148)
高适五十学诗之谬说探源	(153)
也谈《望岳》的立足点	(156)
古典作品教学拾零(四则)	(158)
戴叔伦诗题之误	(161)
孟郊、李贺、张碧、张瀛	(163)

《睢阳感怀诗》讥许远说志疑	(166)
从“岳庙”与“岳寺”谈起	
——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两条注解的 辨析	(168)
王令“署门”诗不足信	(175)
苏老泉就是苏东坡	(176)
老泉·东坡赘语	(178)
“羽扇纶巾”究竟指谁?	(181)
关于苏轼《石钟山记》	(184)
关于《五人墓碑记》	(186)
“三言两语”谈平仄	(189)
读诗词漫记	
——诗词语言	(191)
董道不豫，日月齐光	
——《涉江》赏析	(197)
《长歌行》赏析	(202)
情意缠绵，言词委婉	
——浅析张潮的《江南行》	(204)
奇葩竞放，各有千秋	
——洞庭君山三绝对读	(207)
唐人写早行的几首五律和温庭筠的《商山早行》	(212)
罗邺《赏春》浅析	(218)
细腻含蓄，别具一格	
——读《才调集》中无名氏的杂诗	(220)
黯然一别，去住神伤	
——柳永《雨霖铃》浅析	(223)

借古伤今，因题见意

——读陈与义《巴丘书事》…………… (226)

纳须弥于芥子

——查慎行《舟夜书所见》的精湛技巧…………… (229)

气往赅古，辞来切今

——评胡夏客《昭君辞》…………… (231)

明清诗坛上不可无此一席

——试论胡夏客其人其诗…………… (239)

《唐音癸签》校点前言…………… (254)

校点归震川全集前言…………… (268)

《小仓山房诗文集》校点前言…………… (281)

《唐人绝句类选》前言…………… (296)

《离骚》解 题

《离骚》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有主名之长诗，屈原乃第一位以文学名世之作者。二千年来，人所公认。惟廖季平先生《六译馆丛书·楚辞讲义》独持异议，以为《离骚》乃秦始皇博士所为《仙真人诗》。此实廖先生晚年好怪之一端，不足置辨。

屈原事迹及为《离骚》之缘由，司马迁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言之甚悉，当以为探讨之根据，其言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平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本也，父母者，人之始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史迁曾博极群书，而又漫游各地，“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从陕西直至江浙沅湘，了解流风馀俗。其上距屈原之时不过一二百年，故老相传，广搜博访，此处所言，当为屈原史料之忠实记录，而实后人研究屈原及其创作之

第一手资料。约略言之，有三点至堪注意：

一为屈原之政治简历。屈原曾为楚怀王之“左徒”，参预内政外交之机务，极受信任。按“左徒”之官，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仅《史记·楚世家》记楚顷襄王二十七年“使左徒侍太子于秦”，及三十六年“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令尹为楚之最高官职，而左徒可为令尹，虽曰先侍太子有恩信，其职位非卑，盖可想见，故能参预机务。其后怀王信谗，屈原被疏，按之刘向《新序·节士第七》可相印证，《新序》之言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谗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

刘向之说，与史迁大同而小异。刘向意在借屈原以悟主，非若史公传屈原以书愤，故小有牴牾，当以《史记》为依据。然两者言屈原始见信而终见疏则无二致。

二为《离骚》产生之背景，乃自怨而生，所怨者何？则王之昏庸信谗以疏远忠良也。证之本传及《新序》之说，则谗言之由，内有宠姬郑袖，外有秦谍张仪，中有上官大夫靳尚以至令尹、司马诸权贵。司马迁借为屈原立传而扩大其意义，反映贤良正直与奸邪谄佞之争，为有国有家者之殷鉴。史迁明言《离骚》作于怀王见疏之后，而《新序》云：“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遂启疑窦。史迁自序复有“屈原放逐著《离骚》。”后人泥于此说，遂谓《离骚》作于晚年，作于顷襄之世。实则若取《九章·涉江》之时地相对勘，则非放后之作较然甚明。《涉江》虽短篇，大旨与《离骚》相表里，而时地则殊，以地言，《涉江》写于既放之后，故鄂渚、沅湘、枉渚、辰阳、皆为实地。《离骚》

作于未放之前，玄圃、閼风、扶桑、赤水，纯为假想。以时言，《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为未然之词；《涉江》“年既老而不衰”，则为已然之词。前后判然。至“放逐著《离骚》”之说，则有太名小名之别，说详后。

三为《离骚》一名之含义。史迁但云“离骚者犹离忧也”。以骚为忧，为楚之方言。《国语·楚语》伍举曾有“德义不行，则迹者骚离而远者距违”之语，韦昭注：“骚，愁也。”以骚为忧愁之义，汉人无异词。而于“离”则有二解。班固读离为罹，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离骚》有“进入以离尤兮”即此义。简言之，离骚二字为动宾结构。而王逸则云：“离，别也；骚，愁也。”则此二字为偏正结构，意为离别之忧。《山鬼》“思公子兮徒离忧”，可为注脚。其后，或者据伍举“骚离”之语及扬雄有《畔牢愁》之篇，以离牢一声之转，释离骚为牢骚，则二字为并列关系。而廖季平先生离骚即离绝世俗。以骚为逍遥之合音，用以自圆其仙真人诗之说，实可置之不论不议之列。（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以离绝忧愁释之，似与廖说有渊源）刘永济先生《屈赋通笺离骚解题》从戴震《屈原赋注》之说：

“戴震屈原赋音义曰：‘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忧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其说会通诸家，证以《尔雅》最称周洽，今所当从。”

今日言楚辞诸家，各执一词，或主遭忧，或言离愁，或持牢骚说，此皆于汉有征，并较戴说为近古。然持此非彼，窃所未安。谨案：昔人解易，一名面有三义：变易、不易、易简，传为通谈。细绎史公全文，离骚一名，不妨统遭忧，离愁、牢骚之三义：自怨而生，所发者为牢骚；怨自何来，则遇谗见疏，亦即遭忧作辞之说；战国士风，朝秦暮楚，楚材晋用，习以为常。原才士见斥，本可去之他国，而楚为宗国，原为世臣，义难轻别。忧之

核心则为欲别而不忍别、不能别，此又可为离别之忧作注脚。三义相辅相成，即戴说亦可统之于内，愈见题目内涵之深广，正不必是一而非二也。

《离骚》一名，含义有大小之别，小名则专指此篇，史公传之所云是也。大名则通指屈原之全部作品。《史记·自序》所谓“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所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皆指全部作品而言，非史公自相龃龉也。《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韩愈《感春》四首之二：“屈原《离骚》二十五，不肯铺啜糟与醯。”亦即以首篇《离骚》之名概其全部。宋陈说之谓“惟屈原所传则曰《离骚》，后人效而继之则曰《楚辞》”，并非盲瞽之说。唐初欧阳询等编之《艺文类聚》引屈原著作皆称《离骚》，如卷九《水部下·壑》：“《离骚》曰：‘降望大壑’”实为《远游》之文。卷四十四《乐部四·箛篥》：“《离骚》曰：‘箫锺兮瑶簫’，”实为《九歌·东君》之文。卷九十七《灵异部下·魂魄》引《招魂》则曰《招魂》，又引“《离骚》曰：‘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朔之若岁！惟郢路之修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实为《九章·抽思》，此则唐人以《离骚》为大名之证也。

更征之于古，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即包屈赋之全部，昭明《文选》以骚为体，亦统多篇。《文心雕龙·物色》：“骚述秋兰，绿叶紫茎。”以《九歌·少司命》为《骚》。《世说新语·排调》：“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刘孝标注：“出《离骚》。”此又可证《离骚》之名包《卜居》也。

郭璞注《楚辞》，其书已佚，然散见于《尔雅注》及《山海经注》，尚可见其以《离骚》统屈作之迹。《尔雅·释天》：“暴雨谓之沍”，郭注：“今江东人呼夏月暴雨为淩。《离骚》曰：‘令飘风兮先驱，使淩雨兮洒尘，’是也。”实出《九歌·大

司命》。《山海经·西山经》：“黄帝乃取崑山之玉荣。”郭注：“谓玉华也，《离骚》曰：‘怀琬琰之华英。’又曰‘登昆侖兮食玉英。’”则分别为《远游》及《涉江》。《北山经》：“其兽多兕牝牛。”郭注：“或作樸牛，樸牛见《离骚·天问》，所未详。”《中山经》：“帝之二女居之。”郭注：“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可见郭璞明将《天问》《九歌》《九章》统属之《离骚》。此说当为汉师所传而非自我作古，无怪朱熹《楚辞集注》于屈原各篇统加《离骚》之目，如《离骚·九歌第二》《离骚·天问第三》等，见宋端平本，较然著明。盖古人著书常有以首篇统全书之例也。

明乎《离骚》有大名、小名之辨，则《离骚》专篇依本传作于怀王见疏之时，而非顷襄放逐之世，殆可论定矣。

黄伯思《东观馀论·翼骚序》云：“屈宋诸赋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所谓楚声者即“兮”字，《诗经》里偶有出现。《论语》楚狂之歌有“凤兮凤兮”之句，《孟子·离娄上》记“沧浪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已为短调楚歌。刘向《说苑》记载楚康王时（前559—545）一首《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谄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此则屈子以前楚歌已有此调，屈子借此曲以写愤懑，扩而充之，遂成千古传诵之《离骚》。

《世说新语》原名考略

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梁刘峻的注本，无论从文学、历史或语言哪个角度看，在说部中都是影响较大的书。可是，它的原名问题，却是学术界一件公案，很有研究的必要。

南北宋间汪藻（1079—1154）《世说叙录》曾列有《世说》《刘义庆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四种名称，而作者判断说：

“按晁氏诸本皆作《世说新语》，今以《世说新语》为正。”（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日本影印宋本，标点为引者所加，下同。）

汪书在国内早失传了，所以一般采用黄伯思的说法，认为原名应为《世说新书》，《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一·世说新语三卷》可以作为代表，它说：

“黄伯思《东观馀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

按所引黄伯思之说见其子黄乃所编《东观馀论》卷下《跋世说新语后》，云：

“《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梁豫州荆狱参军刘峻注为十卷。采摭舛误处大抵多就证之，与《裴启语林》近出入，皆清言林囿也。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说澡豆’事以证陆畅事为虚，亦云

‘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大观己丑（三年，1109）中夏七日从宗博张府美借观两月，因讐正所畜本。此本出宗宣献家，比世所行本殊为详备，但累经传写，颇有脱误耳。己丑中秋日借张府美本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以宗正赵士暕明发本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监大内内省供奉李义府本校第十卷。”

（《津逮秘书·东观馀论》）

值得注意的是，黄伯思所见各本皆作《世说新语》与汪藻所据以定名者相同。黄伯思与李纲为表兄弟，又受业于纲父伋之门。事迹见于《东观馀论·附录》所载李纲作的墓志铭，称其卒于政和八年（1118），年四十，则应生于1079，实与汪藻同年生。

黄伯思的论断经《四库全书总目》采用，遂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如清李调元《童山文集》卷十四《世说旧注跋》说：

“段成式《酉阳杂俎》引作《世说新书》，不知何时改作《新语》，相沿至今，不能复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从此说。按唐时有《世说新书》之名，并不始于晚唐的段成式，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复举“《通典》一百五十六引‘曹公军行失道三军皆渴’事，亦作《世说新书》”以证成黄说。

日本的神田醇收藏了一截号称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他在跋尾里说：

“此书旧题云《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尚云《新书》，《菅家文草》有《相府文亭始读〈世说新书〉》诗，黄伯思《东观馀论》辄云《新语》，则其改称当在五季宋初，后来沿称《新语》，无知其初名者矣。”

神田醇大约只看了《东观馀论》的篇名，实际未读其书，似乎连《四库全书总目》也未寓目，所以大大冤枉了黄伯思。其为武断，已可推知。但因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在手，因此得到

罗振玉的极口称赞。罗的《永丰乡人乙稿·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唐写本世说新书〉跋》说：

“神田翁以所为跋尾见示，据段氏《酉阳杂俎》《营家文草》谓此书初名《世说新书》，五季宋初始改称《新语》，其说至精确。余考《唐志》载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引者注：见《新唐书·艺文志卷三·杂家类·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十卷》），则临川之书唐时作《新书》之明证，可补神田翁所举之遗。”

这好象已成定论，其实大谬不然。唐初景龙四年（710）刘知几的《史通》就毫不含糊地提出《世说新语》之名，足以廓清黄伯思以来所谓“唐世原名《世说新书》，五季宋初始改称《新语》”的迷雾。《史通》体例分《内篇》《外篇》，从文体看，《内篇》多骈偶，《外篇》则散行。《内篇·六家》说：

“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外篇·杂说中》几句话尤为明确：

“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著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

在《六家》中为了行文的整饬，所以称《孔子家语》《临川世说》。《杂说中》专评此书，所以用全称《世说新语》。《史通》今日所见各本，此处皆无异文作《新书》者。刘知几不可能自我作古，杜撰新名，致遭物议。足见此书当时原名《世说新语》，决非“五季宋初人所改。”神田醇的意见，不攻自破。奇怪的是纪昀《史通削繁》亲见此文，《四库全书总目》又对刘知几的批评加以辩解：

“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

而对书名却忘了这一条重要证据，亦信本名《世说新书》之说，此真所谓“睫在眼前常不见”，故余特表而出之。

或者以为王方庆时代略早于刘知几，以为唐初本名《世说新书》之一证。然王书仅见于《新唐志》，列于“杂家”，不与《世说》同侪于“小说”，已属可疑。而梁陈间知名学者顾野王已明著《世说新书》《世说新语》之异同。汪藻《世说叙录》在《世说新书》下注云：

“顾野王撰颜氏本跋云：‘诸卷中或曰《世说新书》，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

顾氏当时所见诸卷多作《世说新语》，间或也有作《世说新书》的，故用“或曰”字样。同时又提供了两种书名的微微之辨。汪藻又说：

“按王仲至《世说手跋》云：第十卷无门类，事又多重出，注称敬胤，审非义庆所为，当自他书附此，《世说》其止于九篇（卷）乎？”

合上两条来看，顾野王时，重出的第十卷不分门的仍称《世说新语》，分门的，即号《世说新书》。分的什么门呢？大约就是今本三十六篇之外又采正史中事“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颜本只载直谏而馀二门亡其事。”这就足以说明此书原名《世说新语》，稍加改动多出几门的，则曰《世说新书》。且取神田醇所藏残卷校宋本《世说新语》，字句亦颇有异同，也足以说明两者实有区别。

清人沈铸《铜熨斗斋随笔》卷七，则谓此书原名《世说》云：

“涛案：《太平广记》引王导、桓温、谢鲲诸条皆云出《世说新书》，则宋初本尚作《新书》，不作《新语》。然刘义庆本但作《世说》，见《隋书·经籍志》。《艺文类

聚》《北堂书钞》诸类书所引，亦但作《世说》。《新书》《新语》皆后起之名。”

按沈说似是而实非。汪藻《世说叙录》称《世说》《续世说》者，仅见于史志著录之名，而所见各本不作《世说新语》，即作《世说新书》。可知著录称《世说》者为从简之例，如《毛诗诂训传》但称《毛诗》，《老子道德经》惟称《老子》，《贾谊新书》但称《贾谊》或《贾子》等，屡见不鲜。即如此书，汪藻既定名为《世说新语》而仍称《世说叙录》，陆游、董弁所刻书名《世说新语》，而跋文中只称《世说》（见四部丛刊本）。宋初诸臣编《太平广记》，采自《世说新语》二十六事，多数只注“出《世说》”，其称“出《世说新书》”者五条（王敦澡豆事亦在其中，而《艺文类聚》八十四、八十七两引此事，但蒙上文《世说》称“又曰”而未用《新书》）；其称“出《世说新语》”者四条（卷一百七十三“诸葛靓”、一百七十四“孙齐由”、一百七十六“乐广”、二百四十五“孙子荆”），非若沈氏所云“宋初本尚作《新书》，不作《新语》。”意者当日诸臣编辑，各随所见之本，多从简称，但曰《世说》，或标全名则曰《世说新语》《世说新书》，决不如神田醇所说“后来沿称《新语》，无知其初名。”复考义庆前后，以“语”名书，殆为一时风尚。前有《顾子新语》《郭颁世语》以及《杂语》《琐语》之类，其后，唐元和二年（807）刘肃著《大唐新语》（甚至序中题作《大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商濬所妄加），或亦可为其书原各《世说新语》之一旁证。所幸汪藻《世说叙录》重见中土，为《史通》所引，添出有力证据，得以推其书名变更省略之由。然文献不足，未敢必其信否，姑录之以俟通博。

1957年初稿于南京，1979年重写于清江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〇年第三辑